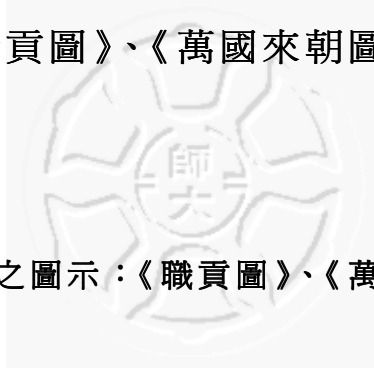


第四章 乾隆朝《職貢圖》、《萬國來朝圖》所體現的天下觀



第一節 乾隆朝天下觀之圖示：《職貢圖》、《萬國來朝圖》

乾隆朝《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雖各有不同的繪製和使用脈落，也隨之發展出不同的形制與風格，然而，二者卻共同以圖像方式體現了乾隆朝對於天下的觀念，以下將就二作的不同表現方式，看出其如何體現此時的天下觀特質。

（一）中心與邊緣

乾隆朝《職貢圖》中，所涵蓋的邦族眾多，不僅有諸多國家，亦有許多少數民族，雖然乾隆朝確實為中國疆域最為遼闊的時期，然而並非所有《職貢圖》內的邦族均與清朝有真正的朝貢關係，則為何全都入畫，而其所依據的地理順序又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

「朝貢」一向是中國歷來處理對外關係時所採用的制度，其由來已久，雖然在各個時期「朝貢」的意義與表現形式會有不同，但總體言之，「朝貢」是一方稱臣納貢，一方冊封賞賜，為一種政治上的上下臣屬關係。¹然而，乾隆朝雖以《職貢圖》統括東西洋各國與少數

¹ 關於中國歷來朝貢制度的情形，可見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

民族，但由畫中各邦族的排列順序卻可見到其與清朝各自不同的遠近關係。畫作第一卷為東西洋各國外藩，排列第一的朝鮮國不僅與清朝有著實質的朝貢關係，且此關係開始得很早，也最晚結束，²接下來的琉球國與安南，也均與清朝維繫著密切且穩定的實質朝貢關係。³而稍後的暹羅、蘇祿、南掌、緬甸等國，與清朝的朝貢關係則較鬆散，且貢期較長，也較早絕貢。⁴至於西洋諸國，其與清朝的關係雖在朝貢體制下進行，但已非實質的朝貢關係，多建立於貿易基礎上。之後的鄂羅斯，由於其與清朝早在 1689 年、1728 年分別簽定「尼不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兩國間的實質關係已由「朝貢」體質轉向「條約」體質。⁵而自畫卷第二卷起，各少數民族的順序則由東北、東南而至西南、西北。由上述乾隆朝《職貢圖》的順序看來，其陳列出一個與清朝關係由外藩而至屬地、由親近而至疏遠、由東向而至西向的安排，透顯出一個由中心而至邊緣及秩序井然的天下觀念。

至於這套《職貢圖》中，少數缺席的民族為滿、漢與蒙族，滿族為清代統治者，自然無需入畫，而為數眾多的漢族，不僅是國家構成的主體，也是清代官僚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至於蒙族，其與滿族的關係早在入關以前即已建立，且一直被視為滿族的同盟者，⁶是故，此缺席的三者即代表了統治階層與所預設的同盟族群。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²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273-275。

³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275-280。

⁴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280-284。

⁵ 中見立夫，〈乾隆皇帝的「世界」認識〉，發表於「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研討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年 12 月 13、14 日，頁 5。

⁶ 關於清朝與蒙古的關係，可見中見立夫，〈乾隆皇帝的「世界」認識〉，發表於「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研討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年 12 月 13、14 日，頁 1-2。

在《萬國來朝圖》中，所有朝貢使節均被置於畫面的下方，且由於其立於太和門之外，中有一走道，走道上全為清朝官吏，外邦藩屬僅立於走道的兩側，甚至延伸至畫外。反觀畫中乾隆或其他象徵禮制的鹵簿陣仗等則居於畫面較為中心的位置，全畫畫面上，華夷所居的中心與邊緣位置清楚可見，而此中心與邊緣不僅是位置而已，也是分辨價值的差異。⁷《萬國來朝圖》中，表現中心與邊緣概念的作法，則與地圖表現權力的方式接近。地圖雖是表現地形或國家疆域的工具，卻也是呈現華夷關係或政治權力的媒介。⁸正如中國所繪製的世界地圖，始終堅持將中國置於畫面的中心，而將周遭藩屬安排於邊緣一隅。

（二）個別與整體

在手卷式《職貢圖》中，羅列於畫面上的各個國家或少數民族，以圖繪及文字說明表現其獨特的相貌與衣飾風俗，表面上所清楚彰顯的是各邦族相「異」之處，觀者可藉由此畫了解其個別特色。然而，這多組圖像實以統一的形制、畫樣與特定的地理順序統合起來。因此可說在個別邦族之異的背後，有一秩序性的力量控制著，正因此秩序性，才能包容內容豐富並架構出此一宏大之作。⁹此種安排，正以隱

⁷ 葛兆光，〈古地圖與思想史〉，《二十一世紀》，61期（2000年10期），頁158-159。

⁸ 近來已有不少將地圖視為符號，進而研究其文化意義的成果，見黑田日出男、Mary Elizabeth Belly、杉本史子主編，《地図と絵図の政治文化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Preface," and J. B. Harley, "The Ma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xv-xxi and 1-5.

⁹ Laura Hostetler 在其書中，亦有關於此畫個別與整體的討論，見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41-49.

晦的方式，表達出清帝國與諸多外邦藩屬的關係，各具其異的邦族藩屬，卻均臣服於清帝國的秩序之下。

再觀《萬國來朝圖》，畫中喧鬧、活潑的各邦族朝貢隊伍已然成爲畫面上吸引觀者注目的有趣情節，在此，畫家對於各邦族貢使的相貌與衣飾絲毫不馬虎，若將其人物裝扮與手卷式《職貢圖》兩相對照，可發現十分接近，可見其相當講究呈現這些貢使的個別形貌衣飾。除了樣貌，貢使們的各異行爲舉止也是表現的要點，如朝鮮國使者有禮、暹羅國使者爲運送貢品而略顯混亂等，各邦族的不同文化表現與教化程度躍然紙上。然而，在太和門外管理場面及門內秩序井然的清朝官員，則是一群提供觀者對照比較的群體，他們不僅是畫中居於管理維繫的角色，也是整個清代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透過畫面太和門內外情況的對比，彰顯出帝國所具有的權威與秩序，及各邦族受此權威秩序維繫下的一面。同樣地，《萬國來朝圖》亦藉由兩相對照下的個別異貌與整體秩序，呈現了清帝國對於天下各邦族的態度。

關於清帝國的天下觀念，雖有大量文字資料的記載，然而，圖像運用在其中仍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圖像並非僅是單純客觀事物的形象記錄，透過圖像獨有的形式特質，往往能以更加自然、不著痕跡的方式反映或建構出製作者的意圖，正如 Geoff King 所說，圖像雖有因襲的格套，然而，文字未嘗沒有所遵循的傳統，¹⁰更重要的是是否能見到這些不同媒介之後所隱含的文化意義。在乾隆朝《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中，又一次見證了圖像被賦予政治意涵，在清代皇權的操縱下使用的情形！

¹⁰ Geoff King, *Mapping Reality: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art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p. 21-22.

第二節 由「天下」而至「萬國」

乾隆朝《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不僅呈現了當朝寓政治目的而建構的天下觀，若置之歷史演進看來，也是一大躍進。在此之前，中國一直有描述外域的文字與圖像，然而均充滿想像色彩，而逐漸演變為更加接近真實的萬國知識，此過程歷經許多不同的刺激與努力，以下將就這段歷程作一概述。

在清代之前，對於士人而言，關於域外的知識多來自於充斥著想像內容的典籍，而對於一般人而言，多來自於旅行記、《職貢圖》一類異域人物圖像及古代以來的神話傳說，如《山海經》等。¹¹以晚明十分普遍的類書《三才圖會》為例，其書中「人物門」的十二至十四卷，便蒐羅了各式域外人物的圖像，¹²但細究其內容，可發現其中真實國家與想像世界並陳，例如既有「朝鮮國」、「暹羅國」等，又有「女人國」、「狗國」、「烏衣國」等，圖像上以奇怪的相貌或異常的身體特徵突出了這些想像的特點，而圖說中則述以暴行或野蠻風俗來強調華夷之別，充分反映了其時人們觀念中的想像異域色彩，而此種混合了真實與想像的知識卻仍於大眾間傳遞著。¹³

此種充滿想像的域外認識，直至十六世紀中頁，隨著外來的刺激逐漸產生變化。首先，耶穌會等傳教士於此時進入中國，他們帶來的

¹¹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發表於「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0月22、23、24日。

¹² 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816-。

¹³ 關於這類知識在晚明的傳播情形，可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期（2003年9月），頁1-47。

地圖與地理書，如利瑪竇的《萬國輿圖》與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等，對中國人產生很大的震撼，不僅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聞的嶄新世界地理知識，也因此撼動著中國傳統中既定的思想。而此時與其接觸的中國人則有著不同的二極反應，多數依然無法接受、斥之為無稽，但另有部分士人如李之藻、徐光啓等，則以十分積極與肯定的態度接受之。隨著利瑪竇等人所帶入中國及在中國當地所繪製地圖的流傳，新的地理知識與觀念則成爲一股伏流。之後，西洋傳教士進入清代宮廷，在地理知識的基礎之上，又帶動了運用科學方法的實測地圖。

而除了傳教士之外，此時仍有不少外國貢使前來，貢使由廣東進入中國，因而由明代擔任廣東布政司逾十年的蔡汝賢所作的《東夷圖說》便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記錄，¹⁴書中的西洋人物圖像，其服飾裝束與日本南蠻人物十分相似，相當熟悉海外事務的蔡汝賢不僅常有機會接觸外國人，或許早已見過海外傳來的域外人物圖像。而此類圖像與其中圖說，已不見過去的想像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真實的認識。以蔡汝賢的身分，無論其著的《東夷圖說》或其可能看見的域外人物圖像，都極可能再傳至其交遊圈內的友人，從而散播此類圖像。

此時還有許多爲貿易目的而來到中國的歐洲商人，而當時進入中國最重要的港口便是澳門，因此今日澳門的記載中，仍留有見證此時中西文化交流的資料。¹⁵例如，同樣在乾隆朝成書的《澳門記略》中，

¹⁴ 蔡汝賢，《東夷圖像》收於四庫全書存目編輯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史部，二五五，頁409-430。

¹⁵ 關於此時澳門作爲西方文化傳入之境的情形，可見湯開業，〈明清之際的澳門——傳教士進入中國最重要的渠道〉，〈澳門是西洋美術傳入中國的發祥地〉，〈明清之際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西洋畫家鉤沉〉，《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出版社，2003）

¹⁶便有記錄了居住於澳門的西洋人面貌，其男子頭頂寬沿大帽，身著蓬鬆褲子，衣服袖口具花邊裝飾，手中執杖的形象十分接近《職貢圖》中的西洋人。

在十六世紀西洋傳教士與歐洲商人東渡之際，其不僅到了中國，也自日本登陸，並在當地掀起了一場西方文化的植入，對於同樣由傳教士帶來的世界地理知識，在日本很快地引起學習與模仿的風潮，¹⁷今日所見南蠻系地圖中，配有民族圖譜的式樣，便源自於荷蘭所繪製的地圖，而後日本及隨之產生。此外，隨著歐洲人登陸所引起的新奇與時尚模仿風潮，也反映在南蠻屏風或其他南蠻工藝上，無論是南蠻系地圖或南蠻屏風，多於長崎一地所生產。由於日本江戶時期進行瑣國政策後，此時開放給荷蘭及中國商人的通商口岸——長崎，便成為外國人聚集的中心，也是製作西洋風貌藝術品的重地。當時，中日間的貿易頻仍，大量商人及船隻往返於長崎與中國港口，如此密切的接觸下，當時盛行的南蠻藝術由此管道輸入中國的機會極大。此外，長崎一地也是版畫生產中心，在此時製作的版畫中，亦不乏繪有外國人物形象之作，而版畫攜帶方便，其流通的情形也就更為容易。

乾隆朝《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中，已不見那些充滿想像的傳說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乾隆所要求必須經歷或真實已知的認識，因此畫中的圖像與文字圖說正確性已大幅提高。此外，在《四庫全書》中，《山海經》一類的書籍已由地理類移至小說類，說明了此時對於異域的認識，已由想像的世界，走入真實的世界。¹⁸然而，在地理知

¹⁶ 印光任、張汝霖同撰，《澳門記略》（台北：學生書局，1970）。

¹⁷ 田毅鵬，〈十六、十七世紀西學東傳與中日兩國世界觀的演化〉，《明史論集》（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421-427。

¹⁸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

識已更豐富、正確的此時，為何在《職貢圖》或《萬國來朝圖》中，仍舊未嘗改變舊有的中國中心論，在此情況之下，正確的知識又有何功能呢？在掌握了真實認識的各邦族人物形象與其地的相關知識後，畫作所顯示的內容則更具說服力，而華夷觀念或中國中心論並非反映了知識層面的不足，反而更能呈顯乾隆運用此類圖像以建立其帝國天下形象的宏圖！

第三節 小結

無論是手卷式《職貢圖》或立軸式《萬國來朝圖》，均屬於中央的朝貢圖像，然而，在乾隆朝尚有不少描繪地方風俗主題的作品，為地方官派人繪製並進奉至宮內者，如《六十七番社采風圖》便是一例。此外，清宮中另有一些地方所進的貢物，而由宮內繪製而成的貢物圖，如《廓爾喀貢馬像圖》等，這些不同的畫作，呈顯了中央與地方或中央的對外關係，由不同層面構築了清帝國的天下圖像，關於其個別的研究雖已有之，但若能統合這些畫作，將其置於乾隆朝的政治脈絡下探討，必當更能完整地了解乾隆如何運用圖像建構其宏偉的天下，或許，此可作為日後繼續研究的方向。

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發表於「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0月22、23、24日。